

文章编号:2095-0365(2020)01-0049-07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的风险及应对策略研究

赵 伟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管理工程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我国与东盟在经济贸易方面有非常多的合作,东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起着连通南北、贯穿东西的重要作用。通过对中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有助于透析中国对东盟地区投资风险的类型及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以政府保障为前提、行业参与为基础、企业应对为根本的三位一体风险应对机制,将对风险的防范、管控和应对贯穿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全过程,为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的投资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关键词:东盟;对外直接投资;投资风险;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20.01.07

一、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新时代下我国政府对国家经济发展方向做的顶层设计,对我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提升国家经济的发展层次具有重大意义。“一带一路”沿线是目前全球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之一^[1]。东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并且沿线港口是重要的节点,同时推动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建设与发展“一带一路”关系密切。东盟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山水相连,并且各成员国大都处于国家海上交通要道,东盟国家的经济政策、政治制度、外交政策都将直接影响中国对外的政治、经济战略,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2]。2017年在我国海外投资总额首次呈现下滑的背景下,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表现依旧强势,投资流量与同期相比,增长了37.4%,东盟已经是我国跨国企业的重点投资区域。

尽管我国与东盟之间的双向投资额增长迅速,但是由于主权争端、政局动荡、文化差异等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在东南亚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FDI”)面临的风险也在与日俱增,并且形势更加复杂,给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的生产投资带来了很大挑战。中国企业必须充分认识东盟的投资风险,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从而促进中国企业在东盟直接投资的顺利进行。

二、我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投资概况及主要风险

根据我国政府在2018年发布的统计公报相关数据表明,2017年我国有4700多家公司在东盟开展海外投资活动,涉及本土员工达35.3万人,OFDI流量达141.19亿美元,在中国对所有国家(地区)投资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香港。

(一)我国对东盟的整体投资概况

1. 我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存流量增长迅速

我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OFDI存量增长速度很快,但比重增速放缓。从2007年开始,我国对东盟OFDI存量呈现着快速增长趋势。如图1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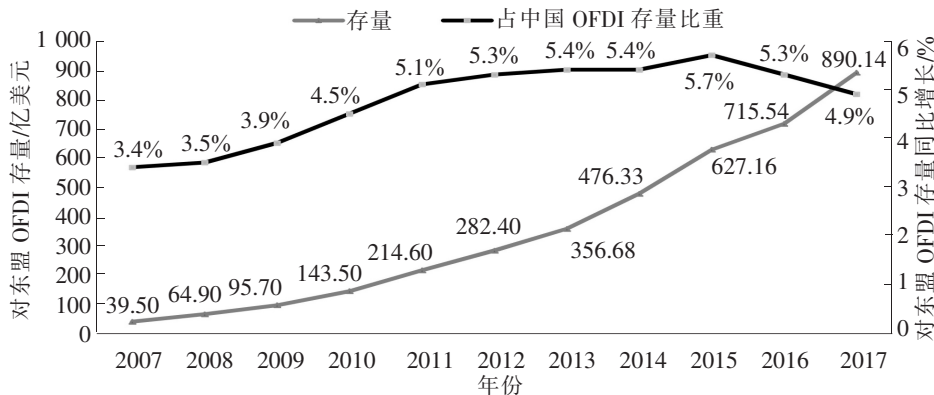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19-09-16

作者简介:赵伟(1991—),男,助教,研究方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信息:赵伟.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的风险及应对策略研究[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4(1): 49-55.

示,2017 年末我国对东盟 OFDI 存量同比增长 24.4%,达到 890.14 亿美元。2007—2017 年末,我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 OFDI 存量从 39.5 亿美元发展到 890.14 亿美元,增加了近 22 倍。尤其在 2010 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宣布成立以后,我国企业在东盟 OFDI 存量开始迅猛增长,2010 年末

OFDI 存量同比增长 49.9%,至 2017 年末仍然保持较高增速。但同时可以看出,自 2010 年以后,东盟占我国 OFDI 存量比重基本上维持在 5%左右,甚至在 2016—2017 年占比连续两年下滑,表明近些年我国在东盟的海外投资并不是很稳定,未来还有很多发展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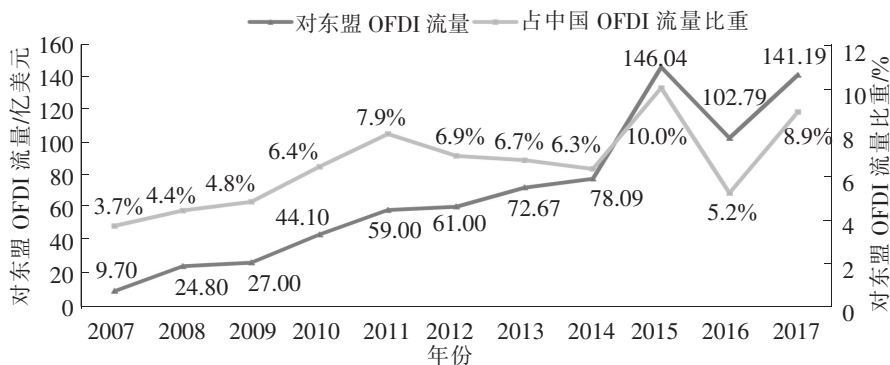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根据 2007—2017 年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得来。

图 1 我国企业对东盟 OFDI 存量状况

我国企业在东盟 OFDI 流量增长迅速,但波动性较强。如图 2 所示,从总量来看,2007—2017 年末,我国企业对东盟 OFDI 流量从 9.7 亿美元上升到 141.19 亿美元。从发展势头来看,我国企业对东盟国家 OFDI 流量比重(占中国 OFDI 流量总额比值)逐年稳步上升,直到 2012 年开始我国企

业对东盟开始表现一种不稳定的投资趋势,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受经济形势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加大了对其他地区的投资;其次,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层次在不断提高,企业海外投资更加趋于成熟和回归理性。



数据来源:根据 2007—2017 年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得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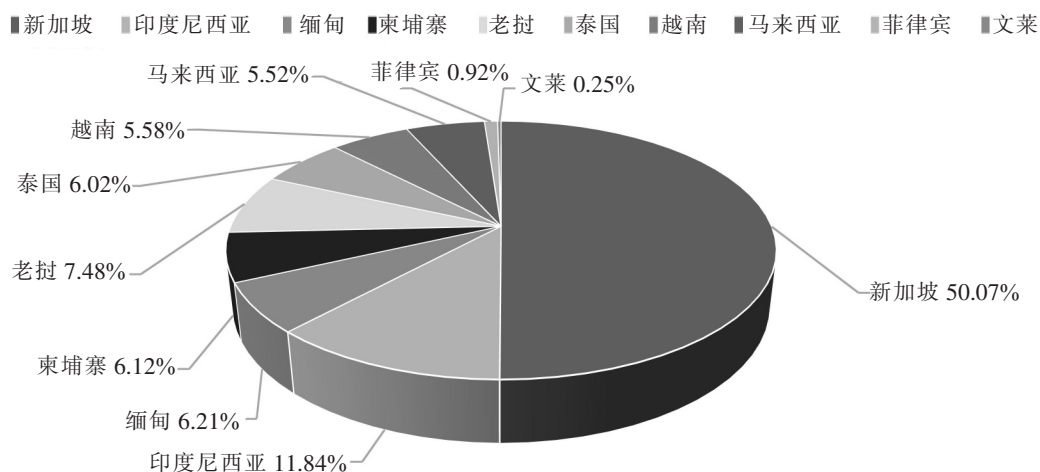
图 2 我国企业对东盟 OFDI 流量状况

2. 我国企业对东盟地区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不平衡

由于东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环境差异较大,导致中国对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分布也是极不平衡^[3]。目前中国对东盟的绝大部分投资主要聚集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等国家。

如图 3 所示,截至 2017 年,中国跨国企业对

东盟 OFDI 存量聚集在新加坡(50.07%)、印尼(11.84%)、老挝(7.48%)、缅甸(6.21%)等国,其次是柬埔寨(6.12%)、泰国(6.02%)、越南(5.58%),对马来西亚(5.52%)、菲律宾(0.92%)的 OFDI 存量相对较少,而在文莱的 OFDI 存量最少,我国在新加坡的投资超过了对东盟总投资的 50%。由此表明,我国在东盟的投资地区差异较大。



数据来源:根据 2007—2017 年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得来。

图 3 2017 年我国企业对东盟十国 OFDI 存量分布比重

3. 我国企业在东盟的 OFDI 行业分化大

总体而言,我国企业在资源、能源行业的劣势突出,且随着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我国正逐步向东盟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具有相对技术优势的产

业。因此,近年来,我国企业在东盟投资绝大部分集中在能源、资源、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等领域^[4],如表 1 所示。

表 1 2011—2017 年我国对东盟 OFDI 流量主要行业

亿美元

行业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制造业	5.69	9.88	11.9	15.22	26.40	35.44	31.7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67	4.4	6.2	12.39	66.74	13.71	21.42
批发和零售业	7.53	6.83	12.34	11.18	17.43	19.63	24.49
建筑业	4.43	6	7	7.97	5.73	6.35	18.96
农林牧渔业	1.9	3	5.43	7.83	5.04	3.74	6.23
采矿业	4.46	17.14	12.34	6.74	0.39	2.41	3.7
金融业	6.2	0.94	5.42	6.73	9.12	4.54	7.3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0	10.82	8.22	6.46	3.11	6.64	6.3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0.88	0.93	1.46	/	0.61	-6.70	7.58

数据来源:根据 2011—2017 年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得来。

2011—2014 年,OFDI 流量增长最快的分别是农林牧渔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涨幅分别达 312.1%、167.5%、118.5%,批发零售业和建筑业增速较快。但邮政和运输业自 2011 年后基本上没有呈现任何发展,甚至在 2016 年出现了负增长,但是在 2017 年又迅速得到发展,基本上接近 2011 年的发展水平。2015 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迅猛增长,成为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最多的领域,比值达到了 45.7%,远远超过其他产业。

(二)我国企业在东盟面临的主要投资风险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展,我国对东盟国家海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由于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再加上区域外大国的强势介入,尤其是美国为了维持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实现所谓的“亚太再平衡”,导致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面临的投资风险更加复杂。

根据表 2 发现,在 2006—2013 年间,中国对东盟投资失败案例中所涉及的行业主要集中在能源和资源行业,表明在这些行业中国企业所受到的投资风险更大。

表 2 我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投资风险案例

年份	失败案例集团	金额/亿美元	项目类别	项目所属国家
2006	南方电网	1.9	能源	柬埔寨
2006	金川集团	10.0	金属	菲律宾
2006	中国铝业	7.9	金属	越南
2007	中国海油	3.7	能源	印度尼西亚
2007	沛辉投资有限公司	17.5	能源	新加坡
2007	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	10.0	交通运输	越南
2008	中兴	3.0	科技	菲律宾
2010	中投	3.6	金属	印度尼西亚
2010	紫金矿业	5.0	金属	菲律宾
2011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36.0	能源	缅甸
2012	中国机械工业	5.1	交通运输	菲律宾
2013	北方工业	3.1	金属	缅甸

数据来源:根据 CGIT 原数据统计而得。

1. 地缘政治所带来的主权争端风险

南海主权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以及政治互信的关键性因素,导致南海局势错综复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中美日在南海的“角力”日趋升温。2009 年以来,随着美国的战略中心开始往亚太转移,美国政府不止一次阐述其在南海所谓的“国家利益”,并通过联合军事演习和军事侦测行动继续加强其在南海的军事存在^[5]。第二,相关小国利益的驱使。大国竞争与小国利益驱使的“双重因素”让南海局势更加复杂。

南海主权争端问题阻碍了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的投资和发展,给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从东盟国家层面上看,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容易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增加中国投资企业的海外风险。“中国威胁论”一直在东盟部分国家有较强的影响力,由于中国在东盟部分国家经贸往来长期处于贸易顺差,加上南海问题的舆论导向,少数国家出现严重的暴力事件,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加剧中国企业在该地区投资的不稳定性^[6]。从国际层面来看,国际舆论的误导和不实言论则会造成地区发展不稳定,国家间冲突加剧。另外,日本、澳大利亚、欧盟部分国家也在积极响应美国的“自由航行运动”,不断在政治、经济领域对中国进行施压,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环境^[7]。因此,这样的投资背景下我国跨国企业在东盟的 OFDI 将会遇

到各种挑战和风险。

2. 国别间的文化差异引发的文化风险

目前文化差异风险已经是各国专家学者研究的焦点话题。文化差异的大小影响着企业资本的流动、员工的管理以及社会组织的交流。文化差异越大,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越难获得包括消费者、政府、投资者以及民众的支持,其投资的难度就越大^[8]。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文化背景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在当地投资将会面临宗教文化差异以及语言、企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9]。

东盟各国文化差异明显,各国都有自己的习俗与宗教文化,如果与东道国宗教问题处理不好,极易引发文化风险。在印尼、马来西亚与文莱等国家伊斯兰教处于绝对的超出地位,菲律宾国内民众主要信仰基督教,其余国家则主要信仰佛教。东盟国家不同的宗教信仰经常会引发宗教矛盾。因此,针对不同的国家需要采取不同的文化策略,尽可能避免由于文化方面的冲突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另外,由于国别间的文化差异,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进行投资过程中,将会面临员工管理以及企业经营等方面的诸多困难^[10]。并购完成后由于不同国家存在文化差异,会对人员配置和经营管理提出更多挑战。国别间的文化差异使两国员工在进行生产管理方面可能会产生冲突与分歧,如果不进行及时的疏导和沟通,对公司的人员管理和市场经营会产生不利影响,进而降低企业的经营水平,给企业的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我国企

业在东盟投资经营过程中,必须重视文化风险因素,减少不必要的文化冲突。

3. 东盟成员国政局动荡风险

东盟成员国整体政治局势还是比较稳定,各成员国基本上都是以发展本国经济为首要任务。但是还是有部分国家政治局势不稳定。政权的更迭、反政府武装、恐怖袭击、政治体制的过渡都会给海外投资企业的经营带来风险。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国是东盟政治局势最不稳定的几个国家。在这些国家政权的变化非常频繁,并且国内派系斗争复杂,时常导致领导人下台或国家体制发生改变。一旦东道国在政策上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就很容易导致政府出现违约行为,使得中国投资者遭受重大经济财产损失。短短十多年时间,泰国就已经经历7位领导人的更迭;缅甸国内局势依然动荡;菲律宾国内反政府活动也是此起彼伏。因此,我国企业在该地区投资面临的政局动荡风险远远大于东盟其他成员国。

4. 东盟各国市场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风险

东盟成员国实力参差不齐,其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和经济法律制度也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由此导致东盟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别,这些差别主要体现在国内通货膨胀问题和国家对外汇管制问题。通货膨胀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普遍的经济性问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严重。以缅甸、越南为例,2017年越南国内通货膨胀率达到6.8%,远远超过经济增速,2017年越南的通货膨胀率同比增长1.87%^[11]。虽然近几年来,越南、缅甸等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稳定,但是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巨大。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不仅严重损害了东道国的整体经济,而且破坏了国内的投资环境,阻碍了外资企业在该地区的投资进程。虽然这几年东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通货膨胀率得到了一定的抑制,但是发生高通货的风险依然存在。

东盟国的外汇政策也是海外直接投资企业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是因为企业的收支、外汇交易过程中,东盟国外汇政策的调整时常会影响到企业的净外汇现金流量和本外币的利润等。受到经济水平和合作深度的影响,东盟并没有统一的货币,与东道国的贸易往来主要是以当地货币为主。因此,我国企业在东盟开展投资活动时将会涉及到不同国家的货币,也就表示东盟各成员国的外汇政策将对中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带来很大影响。

例如,缅甸的外汇管理制度非常严格并且实行汇率双轨制,官方的汇率与实际汇率存在严重的背离问题。因此,我国企业会很面临很大的外汇风险。尽管其他国家的汇率与美元直接挂钩,但是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也会存在很大的汇率风险。

三、中国企业对东盟 OFDI 风险应对策略

(一) 构建多重合作机制,妥善解决南海争端

我国与东盟自2002年建立自贸区以来,经过双边的务实合作,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突出成效,双方投资额增长迅速,经贸往来日益频繁。针对目前我国与东盟相关国家关于南海主权争端问题,双方在政治层面应该主动加强对话,积极协商相应解决方案,避免双方发生直接冲突^[12]。我国与东盟国家应该在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前提下,冷静处理主权争端与冲突、增强政治互信、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双方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积极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2013年李克强总理提出“深化政治互信、聚焦经济发展”两点政治共识,表明中国希望加强与东盟在各领域的友好深化合作,致力推动双边关系稳步发展。在政治领域中国与东盟应该在巩固原有的对话平台基础上,继续保持双边高层次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政治互信,推动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在经济投资领域,我国与东盟在原有的贸易合作基础上,致力于建设升级版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双方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大意义,继续保持经济合作,全面推动贸易合作伙伴关系建设。积极履行《货物贸易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等经贸合作协议,采取相关措施积极应对双方在合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持续巩固双边合作发展关系。

中国与东盟通过在政治、经济领域构建多重合作机制,共同致力于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继续坚持在双边框架下进行沟通和对话,争取以和平谈判协商解决南海争端。

(二) 开展多元文化合作,打破双边文化隔阂

受到区域间文化约束的影响,我国与东盟各

国在价值观、社会习俗、宗教文化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文化约束方面的影响会导致中国跨国企业在某些问题上很难与东盟国家达成一致,尤其是达成文化价值领域的共识。

探索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新形式,打造多元化的文化交流平台,着力打造促进双方民心相通的合作蓝图,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与东盟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针对东南亚地区比较严重的“反华”、“排华”现象,需要从多个层次、多种渠道去解决。首先,要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拉近双方的民心距离,增进双方之间的文化理解。其次,协调好中国与东盟国家平等互利关系,建设和完善双方之间利益共商、合作共商的合作机制,打造“命运共同体”;最后,寻求文化认同,传递我国“美美与共”的价值观,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互信^[13]。除此之外,中国与东盟之间可以强化双边的合作与交流平台常态化建设,深入开展与东盟国家在人文交流、经贸合作等领域的互联互通^[14]。

促进企业层面之间的文化交流,打破东盟国家对中国企业的认知偏见、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与文化认同、消除双边文化隔阂。不同国家的企业员工都有自己本国的文化认同感,一般来说,他们都会按照自己本国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约束自己的行为,对他国的文化会有一定的排斥心理。企业员工间的有效沟通,可以使他们了解彼此文化,突破文化障碍,推动双方间的文化融合,同时企业要充分尊重他国文化习惯与民俗风情,营造良好的文化沟通氛围。

(三)强化政策性指导,构建多层次风险转移通道

面对东盟部分国家的政局动荡风险,我国政府和企业应该采取多元化的风险转移措施,从政策层面和风险转移层面强化跨国企业的风险意识,减少东道国政局动荡风险给企业带来的损失,推动中国企业在东盟的又好又快发展。

第一,政府应该强化政策性指导,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更加充分的海外投资信息,降低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策略失误的可能性。首先,要向中国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东盟国家投资信息。包括对东盟国家政局形势进行评估、评级,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指导;其次,对东盟国家加强调

研,实时更新海外投资信息。东盟国家的国内政局瞬息万变,需要实时对相关数据进行更新,为企业在东盟的投资提供最新的信息。最后,制定相关法律制度政策,从制度层面和法律层面为企业在东盟的投资保驾护航,提升企业对东盟国家投资的信心。

第二,构建多层次的风险转移通道和机制。完善的海外投资风险转移通道能够帮助企业在面临政局动荡风险时,可以迅速实现财产和人员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投资损失。首先,拓宽企业海外融资渠道,企业在东盟进行投资时,除了使用企业自身资金时,还应该积极引入其他资金来源,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股票债券融资,另外要积极引入东盟国企业的资金,实现企业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分散企业投资风险。其次,政府应该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原有的业务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投保人、投资项目等条件的限制,这就使中国更多优秀的民营企业也能获得相应的保障。激励更多的民营资本可以走出国门,在东盟开展投资活动。最后,企业应该建立和完善政治风险应急机制,东道国政局动荡风险具有预测难、破坏大等特点,这就需要企业要建立完善的风险应急机制,包括企业可以低价将公司的财产卖给东道国企业,迅速转移资金,如果面临汇率管制问题,应主动降低企业定价,将剩余利润转移至海外其他公司或者母公司^[15]。

(四)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东盟成员国市场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风险主要体现在通货膨胀与汇率风险等方面。因此,如何应对东道国通货膨胀风险和汇率风险,对于跨国企业至关重要。长期以来,美元都是国际结算的主要货币,但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元的汇率开始呈现不稳定波动,使得跨国企业面临更多的汇率风险。通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扩大人民币试点范围,将会有效降低中国企业对美元结算的依赖性,减少企业跨国投资面临的风险^[16]。目前中国与东盟的人民币贸易结算区域主要集中在新加坡、越南、缅甸、老挝等国家,其他东盟国家与中国的人民币结算业务占比比较少,2017年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贸易总额达到25 124.3亿元,但是人民币跨境结算仅为4 796亿元人民币,占贸易总额的19.1%,表明中国与东盟的人

民币跨境结算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中国与东盟可以联合构建人民币跨境结算平台,进一步深化双方在跨境交易方面的合作,为中国跨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结算提供便利。同时要鼓励更多的中国跨国企业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并且为其

提供一些优惠举措。例如,相关对外投资企业在银行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以及人民币资本金下的业务,可通过开通绿色支付通道,简化审批流程等优惠政策,为提高人民币跨境结算效率提供便利条件^[16]。

参考文献:

- [1] 邹嘉龄,刘春腊,尹国庆,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5): 599-605.
- [2] 许宁宁. 中国与东盟关系现状、趋势、对策[J]. 东南亚纵横, 2012(3): 51-55.
- [3] 韦大字. 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风险与规避策略探析[J]. 对外经贸实务, 2014(10): 77-79.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5.
- [5] 朱锋. 南海主权争议的新态势: 大国战略竞争与小国利益博弈——以南海“981”钻井平台冲突为例[J]. 东北亚论坛, 2015(2): 4-15.
- [6] 王巍, 袁航. 政治风险冲击、制度质量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J]. 东南亚纵横, 2018(3): 72-81.
- [7] 李忠林. 近期南海形势回顾与展望: 成果、问题与对策[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18(4): 69-76.
- [8] 李凝, 胡日东. 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 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 东道国华人网络的调节效应[J]. 华侨大学学报, 2014(3): 93-99.
- [9] 谢琳灿. 我国对东南亚投资的现状与风险防控[J]. 宏观经济管理, 2016(1): 70-73.
- [10] 蔡政元, 巴曙松. 中资企业海外并购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 金融发展研究, 2019(2): 26-31.
- [11] 王丹, 李浩宇, 李平. 中国对东盟农业领域投资的主要风险及解决途径[J]. 对外经贸实务, 2018(11): 53-56.
- [12] 徐莉.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影响因素及控制策略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2.
- [13] 邓玲, 王芳. “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风险及其应对策略[J]. 广西社会科学, 2018(1): 194-197.
- [14] 赵清军, 王雅妮, 周毕芬. 福建省经济增长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12(4): 9-14.
- [15] 梁静波.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与对策[J]. 求实, 2013(4): 40-44.
- [16] 谭小芬, 李昆. 多举措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N]. 中国证券报, 2019-05-14(A03).

Research on the Risk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ment in ASEAN

Zhao Wei

(School of Management Engineering, Anhui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China and ASEAN have a lot of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SEAN is an important node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necting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nd running through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ment development in ASEAN is helpful to analyze the types and causes of China’s investment risks in the ASEAN region. On this basi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hree-in-one risk response mechanism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government guarantee, industry participation, and corporate response. The prevention, control, and response of risks are carried out throughout China’s OFDI in ASEAN. The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n the ASEAN region create a goo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Key words: ASEAN; OFDI; investment risk; coping strategies